

楚辞解读



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瑱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国
学
经
典
解
读
系
列
教
材
詹杭伦 张向荣 编著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楚辞解读

詹杭伦 张向荣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辞解读/詹杭伦, 张向荣编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09769-5

- I. 楚…
- II. ①詹…②张…
- III. 楚辞-文学研究-教材
-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947 号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楚辞解读

詹杭伦 张向荣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5.75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31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纪宝成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间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得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

这实在是一种进步。”这种看法显然是通达和正确的，值得今人加以借鉴。今天我们编写这套教材，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经典学术教育，而绝不是简单地恢复读经。

国学的精华主要凝聚在经史子集四部的经典之中。“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时编修《四库全书》，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的。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一般说来，经部、子部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哲学学科，史部大略相当于历史学科，而集部接近于现代的文学学科，这说明国学与现代学科分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问题，当年的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将四部与现代学科互相融合的。因此，传统经典教育与现代教育可以相得益彰，和谐相生。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学术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思想及其理解中存在的偏颇，国学并没有在百年来的教育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与国学教育在社会各界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强调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之局的到来，国学走向振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所说的国学，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辨析与创新，是今人眼中的国学；其三把国学看作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来阐释、比较、辨析与创新，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因此，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现代价值和创新能力，国学内在的融合中外、推陈出新的精神与能力，是我们今天在建构和谐社会，进行文化创新时所要秉承的。对于传统经典的解读、阐释与辨析，毫无疑问是对于这种理论创新能力的激活，国学的生命力也在这种创新中得以生生不息，走向未来。因此，在国学教育中，这种经典的研读、阐释与辨析，是最要紧的门径之一。

中华经典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属于一种世俗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不相同。比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再比如《庄子》这本书，也很关注通俗的演绎。因此，认为经典高不

可攀的看法并不准确。不过，经典毕竟是经典。唐人编的《艺文类聚》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也者，径也，言五路无所不通”，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好比通向各条路径的通衢一样，它必然会去掉那些浮浅的东西，提升为哲理，有的在形态上不可能不深奥，如《周易》与《老子》这一类经典。因此，需要做一些解读与注释的工作。历来对于经典多有注释与解读，乃至形成了专门的学问。

经典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就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程度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几年，以《论语》、《庄子》等为代表的国学经典，通过现代传媒的推介与个体阅读，在国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它也证明，国学经典教育在今天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中，经典教学类的课程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它与现代文史哲专业教学的一个不同之处与亮点所在。为了满足国学院的教学需要，同时也为了顺应向海内外重张国学经典教育的时代大潮，我们编写出版了这套“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的学术定位，绝不是一般的教材，而是追求具有深厚学术底蕴，深入浅出，明快易读，从而履行中国人民大学追求一流，服务大众的职责。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编写体例上，我们要求体现出“国学经典解读”的宗旨。虽然古往今来，关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类书籍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但是以国学的精神与方法去解读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本系列教材集中从国学的角度去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当代人文视野，贯彻义理、文章与考据融为一体的精神，打通现代文史哲三科的中间环节，通过解读与讲授，培养学生从经典中掌握国学知识，领会国学精神，提高治学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关于选择范围，有的是全本，有的则是选本，选本要求依据编写指导思想在字数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代表性篇目。

篇目注释与解读，是本套教材的重点所在，它由两部分组成：注释时力求准确严谨，同时行文上明快易懂。全篇解读则力求从传统经典中开掘出国学基本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在知识与精神方面获

得提升。所选书目，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来选定。书的编注者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师为主，部分作者则为在国学院任教的人大其他学院的教师，同时也邀请到其他高校和科研部门的一些学者参与这项工作。这些教师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同时，倾心编注了这套教材，表现出对国学教育事业的热忱和投入。

本丛书已列入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重大攻关项目，得到项目资金的支持。这对编好出好这套丛书，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重振国学、弘扬国学方面所持的态度、立场和支持力度。

这套教材的编写，如同人大国学院其他工作一样，均具有筚路蓝缕的探索性质，尽管我们已在主观上尽了自己的努力，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仍不可避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我们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使这套丛书在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共同推进国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是为序。

2008年6月

凡 例

一、本书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王逸《楚辞章句》今传单行本有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吴郡黄省曾校刊本，明隆庆五年（1571年）豫章夫容馆重雕宋版，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明冯绍祖万历十四年（1586年）刊本，日本宽延三年（1740年）庄允益校刊王逸《楚辞章句》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等。本书不作繁琐校勘，仅采用夫容馆本为底本，用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毛氏汲古阁本）作主要校本，并参校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宋端平本），以及《楚辞章句》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湖北丛书本。校语一般不罗列异文，仅在底本有改动处，或异文有参考价值处加以说明。为了排版方便，异体字无异义者，一般直接改为通行字，不出校语。

二、本书之编排，依据王逸《楚辞章句》次序编为十七卷，收录王本全部楚辞作品，不予删削，意在引导读者认识楚辞全貌。编排的顺序为书前导论，各卷原文、注释、段意、解读，书后附录、参考书目、后记。

三、本书之导论，介绍楚辞之价值、楚辞得名由来、先秦两汉楚辞作品的特征、楚辞研究的历史，以及楚辞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意在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四、本书之注释，意在疏通文意，故以简明扼要为主；各家观点择善而从，不作集注式罗列，不轻易批驳他人。采录前人注释，古注之外，以马茂元《楚辞选注》、汤炳正等《楚辞今注》为多。难字加注拼音，主要以《汉语大字典》为准，有异读处，参考古注直音或反切判定。

五、本书所录长篇作品，皆予以分段，并疏通段意。在段意疏解中，必要时对原文采用意译的方式加以疏解，而不是对原文作完整的现代语译，意在引导读者回归原文之研习，而不要仅仅停留在阅读欣赏译文的

阶段。

六、本书之解读，包括解题、全篇结构内容、写作特色以及影响等，比较多地发挥了本书编著者的理解，谨供读者参考。

七、本书各卷之后，列有少量思考题，意在引导读者掩卷沉思，帮助读者复习主要内容，并非全然按照考试题目之出题格式。

八、本书有两个附录，一是有关屈原之传记及其后世之祭文，二是有关楚辞的书目著录以及专书序跋。此乃仿效《楚辞练要》之体例而有所增补，意在帮助研究者汇集资料，省翻检之劳。

目 录

导论	1
第一卷《离骚》解读	36
第二卷《九歌》解读	69
东皇太一	69
云中君	71
湘君	72
湘夫人	74
大司命	76
少司命	78
东君	80
河伯	82
山鬼	84
国殇	86
礼魂	87
第三卷《天问》解读	91
第四卷《九章》解读	111
惜诵	111
涉江	116
哀郢	120
抽思	123
怀沙	127
思美人	131
惜往日	134

橘颂	139
悲回风	141
第五卷《远游》解读	149
第六卷《卜居》解读	164
第七卷《渔父》解读	168
第八卷《九辩》解读	171
第九卷《招魂》解读	190
第十卷《大招》解读	205
第十一卷《惜誓》解读	222
第十二卷《招隐士》解读	232
第十三卷《七谏》解读	237
第十四卷《哀时命》解读	260
第十五卷《九怀》解读	272
第十六卷《九叹》解读	291
第十七卷《九思》解读	330
附录一 传记祭文	356
附录二 著录序跋	365
参考书目	394
后记	399

导 论

一、《楚辞》之价值

《楚辞》作为国学经典，是与《诗经》齐名的集部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梁启超说：“我国最古之文学作品，《三百篇》之外，即数《楚辞》。《三百篇》为中原遗声；《楚辞》则南方新兴民族所创制之新体。《三百篇》虽亦有激越语，而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楚辞》虽亦有含蓄语，而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三百篇》为极质实的现实文学；《楚辞》则富有想象力之纯文学。此其大较也。其技术之应用亦不同道。而《楚辞》表情极回荡之致，体物尽描写之妙，则亦一进步也。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①可见，阅读欣赏《楚辞》，是中国人基本的文化修养之一。

二、楚辞与《楚辞》

（一）楚辞之名称

“楚辞”这个词最早见之于《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

^① 《梁启超讲读书》，137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汉书·朱买臣传》也写道：

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汉书》的“严助”，就是《史记》的“庄助”（避汉明帝刘庄讳而改），两书说的是一回事。这里的楚辞、楚词，可能是时人对来自楚地的一种特殊文体的称呼。朱买臣乃武帝时人，这两条史料中的楚辞或楚词，至少告诉我们，在汉武帝时期，楚辞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称。

楚辞本是渊源于楚地的歌辞。楚辞是以楚地民歌为基础，融合大量的古代神话而产生的；楚辞的篇章大量采取了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楚辞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产生、创作都以屈原为中心，即使在屈原死去之后亦然。因此可以说，由于屈原的作用，楚辞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体裁。

《楚辞》是一部书。目前知道的最早的《楚辞》一书是西汉成帝年间刘向所整理编纂的。他辑录的《楚辞》，收入了先秦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等人的相关作品，并把自己的《九叹》附录其中。因此，《楚辞》就是楚辞之总集的名称。

刘向曾经校阅西汉的皇家藏书，并撰成《别录》，那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目录学著作。刘向正是因为校阅皇家藏书的便利，才辑录成此书的。先秦之时，楚辞往往以单篇的形式流传，虽然也有理由猜测，在刘向辑录之前，也可能产生以楚辞为命名的专集，不过目前尚未发现。

现存最早的《楚辞》一书，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以刘向的编纂为底本，又加上自己作的《九思》和班固的两篇《离骚序》，共成十七卷，就成为今天我们见到的《楚辞章句》。这也是两千多年以来最通行的《楚辞》版本。

要细细考察楚辞的特点，有必要从“楚”和“辞”的分别说起。

（二）楚辞之“楚”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的大背景。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词序》中说：

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若些、只、羌、淬、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菝、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

黄伯思这一说法严格来看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楚辞如屈原的作品中提到的花草树木等，大多数也能在《诗经》中找到。但是，黄氏仍然相当敏锐地捕捉到了楚辞中“楚”的特征。再加上屈、宋作品中体现出的楚地之文化风尚、巫祝祭祀，以及鲜明的语言特征，已经足以证明楚辞的根源即楚地。

第一，从楚地的概况来看，楚，也就是长江、汉水流域。战国时期，楚国的势力最大的时候，其领土曾北到今日之陕西，南至今日之贵州，覆盖今日之湖北、湖南以及安徽、四川、江苏、河南之一部分。而从时间上看，楚文化的孕育与中原文化的孕育大致是同时的。早在殷商时期，两个文化的碰触就已经开始了，古代楚地的贵族很可能就是从中原迁来的部落和当地的南方部落融合形成的。到了西周，这种交往更加频繁和深入，《史记·楚世家》这样记载：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这就证明中原的周朝与楚国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关系。等到东周列国的时候，楚国已经成为最为强大的几个诸侯国之一，版图最大，人口最多，在战国后期出现了“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序》：“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的说法，意谓如果“连横”，秦国将称帝；如果“合纵”，楚国将称王天下。楚国之势力可见一斑，强大的楚国自然造就了楚人那种强烈的爱国之心和自我意识。屈原、项羽都是楚人的代表。

尽管楚国仅是一个诸侯国，但又与其他的诸侯国有所不同。《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说：

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

因此，楚地的经济条件似乎比北方更优越一些，物产更丰富一些。相应的，楚国在青铜器的铸造、丝织品的生产方面在当时也都有了相当高的水平。楚辞《招魂》和《大招》两篇中所描绘的楚国宫廷内那极度的奢华，也证明了当时楚国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

《荀子·正论》说：

世俗之为说者曰：“汤武不善禁令。”曰：“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

意思是说，楚、越两国虽然也是诸侯，其与当时中央政权的关系，和其他诸侯国有所不同。一方面，不少典籍记载了中原诸侯以及周天子称楚国为“蛮荆”；另一方面，楚、越两国的君主都自称王，这也说明了楚国在政治地位上的特殊，这种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也保证了楚地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尽管中原文化和楚地文化之间交流甚多，但从文化上看，楚地之文化仍是大大不同于中原文化的，这成为楚辞能够产生的极重要因素。

总之，楚地的特殊，令楚辞亦特殊于中原地区的“诗”。

第二，从楚地的巫祝传统和神话传统来看，那种强调祭祀、重视鬼神的传统也渗透在楚辞之中。当代的学者在评价屈原的作品时，常常用到的一个形容词是“瑰丽”，就是针对屈原作品中那种迥异于中原文化的巫祝、神话色彩而言的。《汉书·地理志》说：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吕氏春秋·异宝篇》说：

楚人信鬼。

这些隆重的祭祀，是由男觋和女巫来主持的，《国语·楚语下》说：

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巫祝的发达，几乎在每一个古老的民族身上都能找得到，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中原地区的巫祝传统在儒家等文化的影响之下渐渐淡了下去，而楚地的巫祝文化仍然很隆盛。这表现为盛大热烈的祭祀仪式，与祭祀配套的歌舞娱神活动，以及祭祀的主角——鬼神所居住的神话世界。

巫祝的隆盛，自然会影响到文化，也会影响到身处这种文化之中的人。屈原写《九歌》，从形式上看就是一组祭祀使用的祭辞；《招魂》则直接仿效楚地巫觋招魂辞形式来写成；《卜居》也许不一定是屈原所作，但整首辞写的也是一个占卜场景。其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乱辞”、“乱曰”更是祭祀留下来的尾巴，至于《离骚》等作品中出现的“问卜”、“降

神”、“卜名”等体现祭祀色彩的词语亦为数不少。

与巫祝文化相关的就是楚国的神话。屈原在《离骚》中创造了一个无比瑰丽神奇的神话世界，各路神祇一一亮相。我们知道，顾颉刚认为中国古代神话有两大系统，即昆仑系统和蓬莱系统。《山海经》是昆仑神话的有系统的流传记录，而《楚辞》神话接受了昆仑神话。^①屈原作品中的大多数神话人物、神山、神水、神兽都能在《山海经》里找到记载，而《天问》本身更是因其巨大的神话学意义在近代引起关注。因此，从上古神话，到楚地神话，再到楚辞中体现的神话，这其中虽然经历了重重变化，不同时期神话的内涵和精神也大不相同，但毋庸置疑的是，神话对楚辞的影响相当大。

但是，楚国过于浓厚的祭祀风气，却也成为楚国衰落的一个原因。《吕氏春秋·侈乐篇》曾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作为楚国对手的秦国人这样评价楚国的巫祝之风，不能不说是旁观者清。

总之，巫祝和神话的传统的影响，使楚辞独具一格。

第三，楚地的楚歌和楚乐也与楚辞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楚辞作品中提到了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称，如《涉江》、《采菱》、《劳商》、《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楚国与中原诸国在地域、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大量差异，也造就了楚地音乐和歌曲的不同。同时，楚地祭祀的隆盛也使大量乐曲通过祭仪保留了下来。

楚地原有的音乐，古代的时候被称作南风、南音，比如《孟子·离娄上》记载了一首“孺子歌”：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王国维曾称这首“孺子歌”（王氏称之为《沧浪歌》）“已开楚辞体格”。确实，这首歌也载于《楚辞·渔父》之中。此外，还有《论语》里那首有名的《接舆歌》，《说苑》中记载的《子文歌》、《越人歌》等谣曲，它们的特点主要是没有采用《诗经》那种整齐的四言体，而是长短相间，一般都超过四言，这就使容量加大了，并使用语气词“兮”、“些”等。显然，这种语言特点很自然地就被楚辞所继承。

此外，楚地祭祀仪式所保留的音乐也影响了楚辞，使楚辞的音乐性同

^① 参见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2）。

时带有了祭祀性，比如《九歌》、《招魂》同时也是祭祀的歌辞。这不同于当时中原地区的音乐，中原文化的音乐的核心，就是雅颂之乐和郑卫之音的对抗。前者或许是中原音乐的主流，但听的人不多，因为过于沉重与素朴；后者可能富于娱乐性，但又遭受当时士大夫有意识地反对，总体来说，战国时期的中原音乐还是倾向于中正的风格。楚地的祭祀歌曲则是不同的。

在今天，很多西南少数民族保留下来的祭祀歌曲，演唱风格非常独特，也许可视为楚歌的影响。尽管我们已经无法确知楚辞在当时是如何演唱的，但可以想象其风格一定亦是奇崛瑰丽的。在今天对楚辞进行“韵读”，也能感觉其风格的独特性。

当然，强调楚辞之“楚”，是为了凸显楚辞产生的特殊背景，并非有意回避中原文化之影响。事实上，楚辞的产生离不开中原文化的传入。儒家经典如《诗》、《书》、《礼》、《乐》等早已经传入楚国，楚国的士大夫也兼有中原诸国士大夫那种外交、议事时引用《诗》的风格。此外，《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周朝内乱导致的一些文化南移事件：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囿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并且，中原文化毕竟因其理性、实用的精神在南传上远胜于楚文化的北传。因此，在楚辞所产生的战国时期，楚地的文化已经是南北两种文化交融之后的产物了。因此，楚辞的产生，也是两种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果。

总之，楚辞之诞生，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共同作用之结果，但楚辞之特色则主要源于楚地之风土人情、祭祀巫祝、南音谣曲。楚辞就是楚文化之浓缩。

（三）楚辞之“辞”

楚辞既然被称为辞，那么严格说来它与当时的“诗”、后来的“赋”都有区别。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楚辞与诗、与赋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因此，廓清辞与诗、赋之间的关系，把楚辞置于多重文体构成的网络之中，才能更清晰地认识楚辞在历史上的地位。

楚辞的诞生，要晚于《诗》约三百年，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一向也被称为“骚”或“骚体”。自从楚辞出现之后，就逐渐形成了“诗骚”（亦被称为“风骚”）的两大传统。

在今天的学术视域里，诗、骚传统逐渐被定位为两种不同的诗歌传